

《靖江宝卷·圣卷选本》序

段宝林

1984—1987年夏天，我曾带领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来扬州进行民间文学与民俗调查实习。当时了解到靖江县文化馆吴根元馆长等同志已记录、搜集了一些民间流传的讲经。同学们带回这些讲经使我们大吃一惊。宝卷讲经是古代的，怎么现在还在民间活着，这真是一个新的发现，于是我们又请缪炳林同志写了两篇介绍靖江讲经的文章在《北大民俗通讯》上发表。

“宝卷还活着”这个消息使许多同行感到惊奇。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宝卷学术讨论会”上，我也写了专文对此加以介绍，并就如何对民间宝卷进行描写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后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高级研究员司徒洛娃来北大进修，由我负责指导。我也曾带她前来靖江访学，深入到农村，观看了讲经演唱的情况，使她大开了眼界，她很感动，说过去只见过书面的宝卷，并且还翻译了一厚本，用俄文在苏联出版，没想到宝卷讲经在中国还活着，她说以后要写文章做些介绍。

我还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扬州大学中文系的车锡伦同志，他也很重视，我希望他就近进行调查，好好写些调查报告。后来他果然来了不止一次，并写了长篇文章，对靖江讲经作了很好的描写研究。

我请靖江的同志对演出情况作了摄影，并和吴根元、缪炳林同志合作写文章在台湾民俗画刊《汉声》杂志发表。我又在《民俗研究》刊物发表了《活着的宝卷》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就这样，靖江讲经逐渐走向海内外，为世人所重视。

靖江讲经流传在靖江老岸说吴语的地区，是江南移民从老家带过来的。但已和江南宣卷大不相同，江南宣卷一般都照本宣科，像念经一样宣读宝卷做法事，而靖江宝卷则是由佛头自由发挥随意讲唱，增加了大量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用靖江土话讲唱靖江生活，语言和故事都靖江化了。有的内容与原来的宝卷（如《大圣宝卷》、《梓潼宝卷》、《十王宝卷》等）竟毫不相干。这就是说，靖江讲经虽然在形式上仍保留了宗教宣卷的仪规，但只是形式而已，其内涵已被改造为民间生活、民间文学的汇集，表现了农民的心理、思想和感情，惩恶扬善、爱憎分明，并非教人消极厌世而是使人积极向上，积德行善，这是人民自发的精神文明的自然流露，我们决不可简单化地把它们都看成宗教迷信而加以禁止，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抛弃了。

由于文化水准不高，科学知识欠缺，农民信佛迷信等思想是很自然的。我们应在尊重他们的同时普及教育、科学知识，使讲经的内容逐渐减少迷信成份。但应该看到宗教的“因果报应”并非全是迷信，在这迷信的外衣下面有科学规律在起作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反映了一种社会规律——凡是干坏事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种现世报在讲经中是最主要的，而“来生报”的宿命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神佛身上的宗教迷信反而是很少的。

这正是靖江讲经人民性之所在。表面的念佛诵经,实际是人民朴素的道德原则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他们相信行善积德做好事是会有好报的,作恶害人是会受惩罚的,这对于劝人行善、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靖江讲经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具有民俗的共同特点。据我的研究结果,民俗固然有古代历史的遗留成分,但更重要的本质特点则是当时当地条件下,人民所选择的一种最适合他们生活理想的生活方式,简言之即是一种“生活美”。这是在当时当地条件下最美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集体的文化创造,是人民审美观念、世界观的自然表现。移风易俗绝不能凭一纸命令即可禁止或创新,一定要在主观客观条件都具备时,才能实现。这种主观条件主要就是群众的审美观念、科学知识的进步,思想感情的变化,当他们感到原来的风俗不好时,自然会以更好的风俗取代它们。否则,绝不能改变分毫。所以移风易俗的规律不是“先破后立”而是相反,要先立后破,要在主观客观条件都具备了新的更好的风俗的时候,旧俗才会消失。

民俗的发展方向是趋美的。民俗的趋美律就是说,民俗不断向更美的方向发展。民俗的生活美总是相对的,但都不断向着绝对的美进步,增加绝对美的分子。什么是绝对美?我以为这就是真善美的统一。所谓真就是符合科学规律,美和善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美主要就是善。

由此我们可知靖江宝卷的发展方向。它是人民的集体创造,是人民所喜爱的,我们应该尊重人民的选择。人民的思想、科学水平在不断提高,讲经的内容也必然更加符合真善美的要求,那些迷信的内容必然会日益减少,那些神圣、菩萨的形象会逐渐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人们并不一定都相信他们都是真的,也就不会为迷信所误导。而其中民间文化的精华都会放射出更加美好、迷人的艺术光彩,在人民集体的创造中不断产生出更加精美的艺术作品来。我们热烈地赞赏敦煌壁画、敦煌雕塑的美,欣赏文艺复兴的美术大师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宗教画、圣册像,我们并不是崇拜它的宗教迷信,而是欣赏其中的人性美的光辉和艺术美的魅力。对靖江讲经也应作如是观,使这种至今仍活在民间的艺术不断提高,向真善美结合的方向不断进步,这是由演唱者(实际也是创作者)和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诚然,不少讲经作品在流传中有不同的异文,有的还比较粗糙,需要文艺工作者加以提高,使它更精美,更符合现代人民的口味和爱好。

为此要做不少工作,目前已有了很好的基础,按照民间文学工作的规范,首先应作原封不动的科学记录,出版“科学版本”,这是很有科学价值的。然后由文艺工作者对它们进行加工。这种加工如是整理,则不能大动,只作文字的规整。如是改写或再创作,则可以大动,重新构思进行新的创作。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希腊荷马史诗是经过文人不断的艺术加工而后定型的。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学习民间文艺,创作出了不朽的文艺经典,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杰作,都是根据民间故事传说创作的。而歌德的《浮士德》,是他根据流传欧洲的著名传说,用了50多年的时间创作而成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等不都是文人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吗?

根据我的研究,世界上第一流的大作家都是认真向民间文艺学习的,从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到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都是如此。胡适之说:中国韵文中的一切“新玩意儿”(包括体裁、技巧等等)都是首先从民间文学中产生出来的(参见《歌谣周刊》复刊词)。鲁迅说:“乡民的本事,并不亚于大文豪”,“从话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尔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

——雅俗结合律。这是一个文艺繁荣的艺术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参见段宝林《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光明日报 1987 年 12 月 15 日)。

靖江的同志们最近把他们多年辛勤搜集的靖江宝卷汇集起来出版,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部独具特色的作品,其艺术欣赏价值和艺术借鉴、参考价值都是很大的。此书的出版,将会推动靖江宝卷的健康发展,并使文艺工作者学习民间文艺得到宝贵的资料,我们不能不对此壮举报以热烈的掌声。

靖江讲经是“活着的宝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生动活泼的宝卷,这是靖江人民的创造,人民艺术天才、智慧的结晶。此书的出版,为人民保存下了珍贵的中国民间文艺的“活化石”,对科学研究功莫大焉,对人民艺术欣赏也将有大益,不仅可丰富人民的文艺生活,而且可以“惩恶扬善”,有利于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集中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而形成的,当然要特别重视民间文化的重要作品了。

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

各取所需,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各种思想与艺术珍宝,去建设我们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最后,我们不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衷心感谢为此书的搜集、出版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吴根元、王国良、郭寿明、姚富培、缪炳林等同志,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群众,默默奉献,才有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成果,使世人看到别具特色的民间文艺优秀作品,其价值当不亚于敦煌变文与明清宝卷吧!

是为序,祝靖江宝卷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版更多记录或加工的本子,供大家阅读。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晨于靖江